

柔佛古庙游神的纵向寻根与横向寻根¹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Exploration of Johor Chingay Parade

安焕然^{*}

(ONN Huann Jan)

摘要

探视柔佛古庙游神及其演变，既要着力于本土的“横向寻根”新史料的广泛搜索，也应“纵向寻根”到其中国祖籍地潮州做田野考察，由此方能更为透視柔佛古庙游神的“潮州渊源”。并在新马本土与中国潮州的对比中，了解这种源自潮州“营大老爷”的游神民俗如何在新山华社扎根及其在地化演变。而在“横向寻根”方面，新史料的挖掘很重要。其中对旧报章的深度和广度搜索柔佛古庙游神新闻，以时间罗列，整理相关旧报章报导，概览和细腻的重新检视，会有更动态的历史透视。把战前新马不同语文的报章报导拼合对照，亦能更深入探析当时柔佛古庙游神的实际样貌。

关键词：新山、柔佛古庙、游神、华人研究方法

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Johor Chingay Parade and its evolution requires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hat involves both extensive horizontal roots seeking by new historical sources within the local context and vertical exploration through field research in the ancestral homeland, which is Chaozhou (Teochew) in China. This dual approach provides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eochew origins of the Johor Chingay Parade. By comparing local practice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with those in Chaozhou, Chin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Ya Dua Lao Ya (Teochew Pronunciation for Chingay Parade)”, originated from Chaozhou, took root and localized within the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ies in Johor Bahru can be achieved. In terms of horizontal exploration, the discovery of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is crucial. This includes an in-depth and comprehensive search of old newspaper articles on the Johor Chingay Parade, arranging them chronologically, and systematically reviewing the reports. Such a method will offer a more dynamic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dditionally, by comparing and contrasting pre-war newspaper

^{*} 安焕然博士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教授。电邮地址：huannjan.onn@newera.edu.my

¹ 本文为依据2021年10月29日-30日，成功大学历史系主办2021年“中国历史中的日常”国际研讨会”上，笔者宣读〈十九世纪马来西亚新山华人的常民形象及从战前柔佛古庙游神报导探视“华人”样貌〉论文的后半部之修订改写而成。

reports in different languages from Malaysia and Singapore, a deeper analysis of the actual historical appearance of the Johor Chingay Parade can also be achieved.

Keywords: Johor Bahru, Johor Ancient Temple, Chingay Parade, Chinese research methods

前言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除了着力于在地本土的“横向寻根”搜集资料，还得向其中国祖籍地做点“纵向寻根”的工作。本文即以新山柔佛古庙游神这研究主题，以“纵向寻根”到中国潮州祖籍原乡的田野踏查探源，以及“横向寻根”以战前新马本地中英文报章里的剪报，论析柔佛古庙游神的渊源和探视当时在地新山华人的样貌。

一、到中国潮州踏查探源

立庙崇祀，是早期华人移民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其崇奉的神祇亦多与特定社群的移民历史有关联。以马来西亚柔佛新山（Johor Bahru）为例，位于马来半岛南端的新山昔有“小汕头”之称，其开埠和早期的发展，多与十九世纪柔佛港主时代潮州籍人有关（安焕然 2017: 83-110）。就立庙崇祀来说，新山市区迄今最早的一座华人神庙，据说是今柔佛古庙旁边的风雨圣者亭。但在柔佛古庙兴建后，风雨圣者却仅在古庙正殿外左侧一间小亭内安身（舒庆祥 2000: 242）。两庙相联的建筑格局是中国潮汕地区神庙建筑的习惯。风雨圣者，又称雨仙爷，据考是潮汕地区的祈雨神祇。其原乡的信仰中心区就在潮州韩江三角洲中部低平原区（陈景熙 2006: 11-32）。由此可窥，早期新山华人的立庙，与潮州人的民间信仰有关。

至于柔佛古庙，亦是一间传统潮州式的建筑庙宇，位于新山市区最古老的直律街。关于柔佛古庙的创立年代，缺乏庙碑之记载，但庙里现存具有纪年的最早一件文物是“同治庚午”（1870年）由“中国潮州众治子敬立”的“总握天枢”牌匾，说明柔佛古庙迄今至少已有150余年的历史。民间相传是由当时新山最具影响力的潮籍大头家陈旭年发起倡建的（吴华 1997: 52-55）。当地华社还有这样的一个民间传说，柔佛古庙建竣时还曾邀请苏丹阿武峇卡（Sultan Abu Bakar）殿下前来主持开幕大典：“推龙门”仪式。这个传说故事透露出新山华社与柔佛马来皇室之间友好和密切的关系。不论这个传说真确与否，至少在民众的社会心理上却是如此想像的（吴华 1997: 275）。

柔佛古庙内供奉的主神共有五尊：元天上帝、感天大帝、洪仙大帝、华光大帝和赵大元帅。座于正殿正中的元天上帝，脚踏龟蛇，实是玄天上帝的造型，而且神诞同样是农历三月初三。当地潮帮人士都俗称该元天上帝为“大老爷”。按潮州民俗来说，指的就是这个社区的社庙主神。而在同一座神龛上，元天上帝两侧是华光大帝和赵大元帅。惟感天大帝和洪仙大帝则独立安奉在左右另两座神龛。如此的布局，很有可能是象征这五尊主神是来自三个“移神”的系谱，即位于正中神龛的元天上帝、华光大帝和赵大元帅是一组，另两组是感天大帝和洪仙大帝。推断柔佛古庙的神源有其中国原乡（潮州）和本地（新山）华人移民迁徙的脉络可寻（安焕然 2018年3月: 61-64）。

每年的农历正月二十至廿二日的柔佛古庙游神是新山华社的一大盛事。从其传统形制之用语，例如把游神称为“营大老爷”，又把游神绕境期间神像出庙门后暂时停驻让社区信众膜拜的地方称为“神厂”，这些都是潮州用语，迄今潮汕地区都还在普遍使用。“营”是潮州方言，带有绕境“巡土安境”之意。而在闽南、台湾则一般写成“迎”。方言用词之不同（虽是同样的意思），可窥其俗之原乡出处。而“营大老爷”即是我们所熟知的带有驱走秽气，祈求丰登，保境平安的意蕴，实际上也带有整合和强化社区秩序的功能。²然而，柔佛古庙游神亦有其在地化的演变，把原本来自潮汕地区的传统游神民俗经其在地化后，逐渐演变成跨帮群整合的“五帮共庆”之社会秩序结构的展现，³进而经“文化新山”有意识之打造此神人嘉年华会，古庙游神目前已列为马来西亚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⁴

柔佛古庙游神始于何时，尚不可考。根据1950年《马来亚潮侨通鉴》引自前辈的口述：“据传柔佛新山每逢阴历正月二十日，为游神之期，全柔各港之港主，须各派出航船一艘，灯笼一对，前赴新山参加游神，盛极一时（潘醒农 1950: 43）”。而更明确的印证此民间口述的是1890年的英文报章《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的报导，该报记者曾记述当时新山周边种植甘蜜和胡椒的各个港脚之船舶皆聚集于此，参与古庙游神活动（“游神”一词在当时的英文报章称为annual procession或Chingay）。⁵由此可窥，柔佛古庙游神源起于十九世纪柔佛港主时代，最初应是与新山周边各港脚，主要是潮籍港主的参与有关，有其历史因缘。1888年（光绪十四年）的《叻报》也有对柔佛古庙游神的记载，当时写成“柔佛赛神”：“柔佛地方向例每年于正月二十日

² 根据黄挺《潮汕文化源流》，“营老爷”是由潮州乡间的“伯公”祭祀发展而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在社区的整合与扩展的过程，产生社祭与庙祀的混合。神庙所供奉的某一位神明也就成为这个社区的社神，潮州人将它称作“大老爷”。见黄挺，1997，《潮汕文化源流》，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页267-269。

³ “五帮”是指潮帮、广肇、福建、客家和海南帮。游神期间，五帮会馆各自负责供奉游古庙里的五尊主神。其中，海南帮供奉赵大元帅、广肇华光大帝、客家感天大帝、福建洪仙大帝以及游神殿后之潮帮元天上帝。这些神明不一定是各帮的原乡神，而是因古庙游神在地社群资源整合下的结果。

⁴ 关于柔佛古庙游神的形制演变及其神人嘉年华会的打造，本人已有多篇论文专论，于此就不赘论述。相关论文可参见安焕然，2011，〈神人嘉年华：柔佛古庙游神文化的承传与再造〉，收载于叶树姗《2011妈祖国际学术研讨会：民俗、观光与文化资产论文集》，台中：台中市政府，页19-39。此文亦于2017年修订改写，收载于安焕然《文化新山：华人社会文化研究》第九章，新山：南方大学学院出版社，2017，页187-215。另有安焕然，2018a，〈国家介入与华社回应：马来西亚柔佛古庙游神的在地化演变〉，张琼惠、梁一萍主编，《移动之民：海外华人研究的新视野》，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出版中心，页237-255；安焕然，2018b，〈马来西亚柔佛古庙的“保庙”与“重建”〉，陈益源主编《台湾寺庙文资保存与社会贡献》，台北：里仁书局，页539-560。

⁵ “Johore News. (From Our Own Correspondent)”, Straits Times Weekly Issue, 11 February 1890, Page 10。另，本人在2017年担任南方大学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期间，曾特聘当时还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读博士的莫家浩（现为南方大学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对战前报章报导柔佛古庙游神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相关报章资料之辑录，可参见莫家浩编，2017年2月，《战前报章有关柔佛古庙游神文献资料辑录》，新山：南方大学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学术单刊第十八种。

为赛神之期。仪仗摇风，族旗映日，更召名优往为演剧，亦可算穷荒小岛中之繁华世界。本日该处赛会之期已届，谅今春风景当不减于曩年，盍往观乎得以及时行乐也。”⁶所谓“曩年”即“往年”的意思，可知柔佛古庙游神应在1888年以前既已存在。

上引《叻报》所记之“赛神”，当指“迎神赛会”。它是近世中国华南闽、潮地区庶民文化生活中最为热闹的场合。迎神赛会及其衍生的文化娱乐活动的形制，原是受到家族制度的影响。通过游神活动，它加强地方族人团结，同时亦是直接关系到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外部威望，成为家族与外部联系的一个重要手段（陈支平1991：219-237）。这种源自华南地区的迎神赛会传统民俗，随着早期华人的移民，根植于东南亚社会之后展示了其文化调适于本土社会的再生能力。在东南亚，包括像柔佛新山的华人移民，并非“举族而迁”的移植模式，而是以“帮”的格局拓展，再加上新山的历史因缘，这种源自华南原乡的游神民俗有了其特殊的本土化历史演变和再造。从“潮州民俗”到“五帮共庆”，一来是因港主时代柔佛古庙已成新山的社庙，是战前新山华人社会文化格局的产物，柔佛古庙并非专属于某个帮群所独有。其次，游神活动之所以由五帮来分工承担，民间相传有指说是因为战前柔佛华侨公所为解决抬神问题而进行社会协商后的规约。⁷

但柔佛古庙游神纵有其在地化演变，正月二十日的一连三天是柔佛古庙游神之日，它既不是柔佛古庙诸神的神诞，也不是庙宇落成的庆日，而是一般推断柔佛古庙游神是源自于潮州地区“营大老爷”民俗，⁸其历史文化渊源与素有“小汕头”之称的新山移民形态是相契合的。从“横向寻根”探索柔佛古庙的神源系谱，根据民间说法，柔佛古庙元天上帝的香火，是潮籍人士陈大存从新山市郊的陈厝港玄天上帝庙（灵山宫）请来的。⁹陈厝港是义兴领袖陈开顺于1844年取得柔佛第二张港契所开辟的港脚，其开发历史比新山市区的开埠还早。至今陈厝港仍有两座据说是陈开顺开港时期所建立的古庙，一为灵山宫，原名玄天上帝庙，主祀玄天上帝，配祀赵大元帝和华光大帝；另一则是在灵山宫不远处，靠地不佬河（Sungai Tebrau）边的天尊宫，主祀持剑骑虎的感天大帝。由此观之，柔佛古庙供奉的其中四尊主神，都能在陈厝港找到其移神的轨迹。至于陈厝港灵山宫玄天上帝的香火，相传又是邑人从潮州浮洋请过来的

⁶ 《柔佛赛神》，《叻报》，1888年3月3日（光绪十四年戊子正月廿一日）。

⁷ 据说早期古庙游神在人力资源动员上并不如今日顺畅，为一劳永逸解决每年的雇人抬神问题，1922年柔佛华侨公所成立并接管柔佛古庙后，华侨公所乃与新山各帮群协商，将柔佛古庙出游的五尊主神，分别交由五帮各自负责抬游。协商结果，众神出游时的排序，依秩是先由海南帮打先锋，负责抬神赵大元帝，次则广肇帮抬华光大帝，客家帮抬感天大帝，福建帮抬洪仙大帝，最后由潮帮负责抬游元天上帝。这种配置因袭下来，乃有某位神明属于某帮负责的传统，进而演变成为独特的“五帮共庆”游神格局。这样的说法见于黄建成〈新山一年一度的游神庆典历史〉，该文收载于吴华主编，1997，《柔佛古庙专辑》，新山中华公会。

⁸ 至今，新山潮帮人士对其所供奉的元天上帝之参与游神仍习惯称之为“营大老爷”。相关论述可参见李永球〈游神是宗教文化〉，《星洲日报》星洲广场“田野行脚”专栏，2006年3月19日；陈再藩〈正月营老爷永远精彩〉，《星洲日报》大柔佛·大家谈版，2007年3月11日；安焕然，2008年10月，《柔佛古庙及其游神传统的演变》，《南洋学报》，第62卷，页35-50。

⁹ 陈大存是新山纱玉街老巴刹（菜市场）的承租人，据说他也是一名义兴领袖。吴华，1997，《柔佛古庙的历史与修复》，《柔佛古庙专辑》，新山中华公会，页55。

(吴华 2006: 28; 吴华 1997: 174)。¹⁰由此，更可以窥探出柔佛古庙与陈厝港和中国潮州原乡之间的移神渊源。农历正月至二月“营大老爷”是潮州地区相当普遍的传统民俗活动。1937年，沈敏在《潮安年节风俗谈》一书指出此乃“初春农闲的时节，各地有游神行乐的习俗”，“从旧历的正月中旬到二月初旬，差不多没有间断的”，一些较大规模的游神，更是“游人达十余万，全城如醉如狂”。¹¹很显然，这是中国潮汕地区农闲时节很普遍的游神行乐民俗活动。¹²因而诚如新山老前辈的追述，新山是在十九世纪中期港主时代主要由潮籍人士所开埠的城市，民间相传柔佛古庙是由潮籍领袖陈旭年所启建，庙中的主神元天上帝相传乃潮安恭请香火至当年义兴首领陈开顺开发之陈厝港的灵山宫，再传至柔佛古庙。因而前来奉祀者，一切风俗概依潮州旧例举办。正月游神乃潮人之风俗，由于时世推移逐渐演变而为新山华人的共同风尚（纪茂深 1970: 173-175）。

然而除了民间相传和口述记录，我们还找不到与陈开顺有关的中国原始文献（即使是潮州《陈氏族谱》亦尚难对合），¹³也未找到陈开顺的潮州故里东凤乡有玄天上帝出游的文献。所以新山柔佛古庙游神如何与中国潮州有些直接的资料佐证呢？基于此，“纵向寻根”往中国潮州做田野调查，寻找营大老爷之风俗，这是需要的。2007年7月15日，在韩山师范学院陈景熙老师（现任汕头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协助下，笔者曾到陈开顺港主的故里潮州东凤镇济安善堂和东凤首庙实地考察。东凤首庙主祀的虽是大王公（三山国王），但我们竟在其隔壁的济安善堂后殿“惊见”玄天上帝、赵大元帅、华光大帝的神像供奉。据东凤济安善堂福利会时任秘书长陈克锐先生（当时72岁）的讲述，一百多年前东凤镇韩江河堤的堤顶处原有一间玄天上帝庙，庙前有个渡口，堤上都是商铺。每年正月廿五日有“营大老爷”（玄天上帝）游神习俗，堤顶和堤下市场商铺都会题钱参与游神事务。至于东凤的大王公庙，则是在堤下，1980年代公路改建才将其迁至堤上，反而是玄天上帝庙在中国“解放”后就已被拆除了，神像被村民藏了起来，直至1997年才“请出”，供奉于济安善堂的后殿。

根据陈克锐老先生的口述，东凤陈姓的大房、二房早年多有族人出洋新马和泰国，其中的二房多居住在东凤堤下市场，供奉大老爷。这段口述，是否就与当年陈开顺或其族人等东凤乡人把玄天上帝香火移来新山（或陈厝港）有关，柔佛古庙游神是否也与这东凤大老爷游神有渊源？有待进一步探讨，仅此附记于此。另，我们的田野踏

¹⁰ 这种说法也有数篇文章记述，包括舒庆祥，〈一条河一口井孕育全村人——陈厝港的历史〉，载于吴华主编，2006，《陈厝港方志》，新山中华公会教育委员会，页28。另见黄建成〈新山一年一度的游神庆典历史〉，吴华主编，1997，《柔佛古庙专辑》，新山中华公会，页174。

¹¹ 详见沈敏《潮州年节风俗谈》。沈敏这本《潮州年节风俗谈》初版为1937年。本文所引乃1996年之再版，潮州：研轮印务局，页36、12。

¹² 潮州的“营老爷”多是选择在“神下天”之后，主要在元宵之后（正月十五），二月也有，少数甚至在三月。这也和柔佛古庙游神的日期相吻合。2007年7月14日，笔者在韩山师范学院师生的协助下，于潮州地区进行实地田野考察，得陈景熙讲师告知以上讯息，谨表致谢。

¹³ 汕头大学图书馆存有《潮州陈氏有庆堂》和《思成堂》两本族谱，但族谱里没有“陈开顺”的记录。至于新加坡社公庙五虎祠陈开顺神主牌有刻记其另一字号“贞国”，《潮州陈氏有庆堂》族谱至少有三处提及。但一个说贞国有三个儿子，一个说贞国妻李氏子阿村，一个记说贞国妻林氏但又名陈开国。以上三则“陈贞国”的资料，都没有强而有力的论据论说“新新”之义兴领袖陈开顺（陈贞国）就是谱族里的其中一个“陈贞国”。

查，潮州浮洋也有一间香火颇盛的玄帝庙（俗称浮洋大庵），而在其不远处亦有一间感天大帝庙。根据镇上住民说，感天大帝庙之原址，原是一个市集渡口，早年村民多是经由此渡口沿江出洋去的。此外，我们也到浮洋斗文上村雨仙庙和揭阳登岗孙畔村圣者古庙的雨仙爷祖庙做考察，并在孙畔村圣者古庙见到与之相邻有间“小庙”：玄天上帝庙，内供玄天上帝、华光大帝和赵大元帅。这个场景即与柔佛古庙成了强烈比对，不同只是新山的柔佛古庙格局较大，风雨圣者亭在其旁侧，而孙畔村的则正好相反。又，新山华社还流传有一说法，廖内民丹岛有座玄天上帝庙，恐亦有所渊源。民间另有一说，祀玄天上帝是义兴天地会“反清复明”的象征。以上论说，都有待做更进一步的查考。乡土研究的历史，太多断裂，也太多想像。从横向寻根和纵向寻根的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再结合文献资料的解读，相互对照，或许慢慢会探出一幅潮人迁徙大传奇的构图。

二、战前中英文报章里的柔佛古庙游神

把关注焦点再拉回在地新山的柔佛古庙游神，进行“横向寻根”的研究。有意思的是，从新马旧报章史料的深度广泛搜索，又会有新发现。原来战前的中文和英文报章对柔佛古庙游神的记述亦有着不同的报导偏向视角和态度。柔佛古庙游神在中文报导里一般突显的是其热闹欢腾的气象。演戏酬神、形形色色的游神表演，好不热闹。报导亦常记述海峡对岸“叻地”（新加坡）华人竞相到来凑热闹的欢欣会景。常言“盍往观乎”（何不去凑凑热闹）？例如前述那则最早提及古庙游神的《叻报》记载，1888年古庙游神“可算穷荒小岛之繁华世界。本日该处赛会之期已届，谅今春风景当不减于曩年。盍往观乎，以及时行乐也。”¹⁴1890年《叻报》记说古庙游神期间，新加坡“叻地诸人往为旧玩者，亦不乏人，是亦可见一时之盛也。”¹⁵筹办游神是要花费不少的，惟“奉神出游，为阖境祈福，各董事均不惜钜资，雕扎点景，形形色色，斗巧争奇，其庆闹之情形，可以想像矣！好游之士盍往观乎！”¹⁶即使到了1930年代（此时已是五四运动展开新思潮时期），中文报章标题仍言“柔佛华侨筹款迎神演剧三天，届时当有一番热闹”¹⁷，“柔佛迎神前后观，人景舞龙鲤鱼队应有尽有，观众人山人海，突破十年来未见纪录”¹⁸。“柔佛将有迎神会，演戏提灯一连举行三日”“届时将有一番大热闹云”¹⁹。“柔佛国，万人空巷争看”“爆竹之声盈耳”“今年行情好，不妨大吹又大擂，据谓：如不出巡全柔华人不得平安。”²⁰1937年那一年的游神，《总汇新报》报导“柔佛新山我侨迎神大热闹，一年一度今年大铺张，提灯演剧一连三日”“热

¹⁴ 《叻报》，1888年3月3日，页二。本论文引用之旧剪报主要参考自莫家浩编，2017年2月，《战前报章有关柔佛古庙游神文献资料辑录》，新山：南方大学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学术单刊第十八种。其下皆同。

¹⁵ 《叻报》1890年2月13日，页二。

¹⁶ 《叻报》，1895年2月15日，页三。

¹⁷ 《南洋商报》，1935年2月20日，第七版。

¹⁸ 《南洋商报》，1935年3月1日，第八版。

¹⁹ 《南洋商报》，1937年2月27日，第十版，南洋要闻一。

²⁰ 《南洋商报》，1937年3月4日，第五版，本坡要闻一。

闹之情形，将比往年加倍云”²¹。但中文报章对有关游神细部形制的描述其实并不多见，仅1935年《南洋商报》驻柔佛特约记者永鸣的专题报导，较大篇幅叙述古庙游神的“清道情形”、“迎神分析”、“神厂写真”、“送神情形”等场面，²²保留了珍贵的实录记录。

至于游神期间的官民互动，中文报导关心的主要还是游神能不能欢欣共庆，例如政府允许不允许燃放鞭炮的问题。²³提及维持秩序“苦煞了一般街警”的中文报导，就目前的查索仅有一篇。²⁴倒是英文报章以社区治安、交通秩序维持之考量视角，以“客观”“冷静”的笔触，偏重于报导游神的活动安排，现场的情况，例如前举1890年《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报导游神各港脚船舶聚集新山参与游神之实相。在游神期间的交通安排上，也提及有专车载客从新加坡北部克兰芝（Kranji）到来新山参加游神。²⁵

英文报章是以Chingay来指称游神的。这词应该是一个源自福建方言tsng ge转译的词汇，后来被海峡殖民地政府当局用来意指“妆艺大游行”之活动。既然是一个“大游行”活动，自然就涉及社区秩序管理治安问题。而交通是一个重要考量。因而英文报章关注的是游神期间新山市区的交通拥堵情况，以及警察如何协助维持交通秩序的报导。²⁶此外，英文报章也多次报导了社区封路管制的游神路线，政府所下令之规约，更让我们得以窥得古庙游神之具体实况及其巡境绕境范围和神厂设置的变迁。而绕境路线通常包括通过柔佛大王宫，这路线的记载契合了游神期间柔佛王室成员惯例也会参与观礼的民间传说。但1922年的《新加坡自由西报》（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报导游神的巡境路境还曾包括新山市区东边临海的新甘光（Kampong Bahru），²⁷这一区原本是离市中心商业区较为偏远，但属于潮籍大家头林亚相的活动地盘，那里曾建有学校和赌馆。然而，1929年以后的新闻报导提及的游神路线就不再提及有绕境这一带，而仅局限于新山市中心至西边柔佛大王宫。²⁸而且把游神热闹的场面从原有潮人聚集的陈旭年街、纱玉街延伸到纱玉河（Sungai Segget）另一边广肇帮群经营兴旺娱乐场

²¹ 《总汇新报》，1937年3月4日，第三张第二版，要闻四。

²² 〈柔佛迎神前后观〉，《南洋商报》，1935年3月1日，第八版。

²³ 〈昔属废历年各节目，燃放鞭炮时间〉，《南洋商报》，1938年12月28日，第十五版，南洋要闻二。〈柔佛公共通路附近，准燃爆竹时间，柔警察厅长在宪报公布〉，《南洋商报》，1939年12月28日，第六版，本坡要闻一。

²⁴ 〈柔佛迎神会，昨热烈举行，花车景架，苦煞了一般街警〉，《总汇新报》，1937年3月6日，第三张第三版，要闻五。

²⁵ “Singapore-Kranji Railway, For The Accommodation of Vistitors to the Annual”,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22 February 1908, Page1, Advertisements Column 3.z该报导指说是用新加坡火车专载(railway)。惟当时新柔长堤未建，火车陆路不通。依据莫家浩的推断，当是在新加坡搭火车，到克兰芝后，再转搭渡轮穿梭两岸。见莫家浩编，2017年2月，《战前报章有关柔佛古庙游神文献资料辑录》之〈导言〉，新山：南方大学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学术单刊第十八种，页4。

²⁶ “Johore Jottings, The Chingay Procession”, *Malaya Tribune*, 5 March 1929, Page11.

²⁷ “Johore News, The Chingay”,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21 February, 1922, Page7.

²⁸ “Johore Jottings, The Chingay Procession”, *Malaya Tribune*, 5 March 1929, Page 11.

所的黄亚福街和兆楠街（Jalan Siew Nam）及火车站一带，这也反映了1920年代中期以后新政局主导之下的新山华人帮群人口结构的改变之实相。²⁹

福建帮与潮州帮之间在游神时的冲突，也时有在英文报章记述。尤其是在1929年，英文报章报导新山潮州帮因不获得在神厂直立戏台演潮戏，有感贬低潮州帮地位而抵制参与是年的古庙游神活动。³⁰然而，帮群间抬神时之冲撞，在中文报章虽有报导，但文字的记述并未明显指出帮群间之矛盾，而只是以巧妙的文字显示各帮势力之强弱。柔佛古庙“五帮共庆”之众神巡游，至少在1920年代已成形，但在游神顺序上，战前的形制缺乏稳定性。一般言之，潮帮元（玄）天上帝理应“殿后为尊”，但1921年《新国民日报》却记说是福帮洪仙大帝殿后。³¹惟至1935年以后的记载，跟现在的形制一样，潮帮元（玄）天上帝殿后。³²这种由哪个帮抬神殿后的不一致现象，恐与当时的帮群势力“较劲”有关。而且在游神队伍之中，各帮声势强弱分明。中文记者报导指说“广帮客帮，全无铺张”，游神队伍的参与人数不多，³³尤其是客家帮更是“较他为冷淡，不过循例而已”。³⁴而琼帮游神队伍则多有“黑藉中人”。³⁵但是，在五帮之中，人多势众，最强猛的不是“老牌”潮帮，而是二十世纪初期因橡胶业及码头运输、建材业崛起的福建帮，“其生色又非潮琼二帮所可及矣”。³⁶这亦是二十世纪初期新山华社各帮群经济势力的相应投射。

然而，身为中文媒体舆论界的文化人和记者，对游神报导的同时也在字里行间秉持匡正社会风气的道德使命，深具在地的关怀向度。游神期间，赌馆和娼妓业兴旺，中文媒体其实报导了。例如1903年《天南新报》的报导〈柔佛会景〉，记说古庙游神“此华人俗例，由来已久”。游神之时“赌场点缀一新，灯色辉煌，连宵达旦。且花粉丛中如妓馆娼楼，顿增声价。即牛鬼蛇神地狱变相者亦较平时每宵增值一元。而寻花问柳之徒，趋之若鹜，皆视娼家如客栈。虽曰风月寻欢，然到埠助庆者之繁多，亦可想而知矣。”³⁷但中文记者的报导，却常在其行文中加插带有规劝和批判的笔触。例如1910年《南洋总汇新报》的报导，标题即打上〈柔佛赌骂之嘻嘻笑〉，带着半嘲讽半规劝的语气写说古庙游神期间：

²⁹ 此时英国顾问官主导柔佛政局，1917年废除港主制度，1916至1919年以潮人为主的义兴会党被令解散和清盘。甘蜜业之没落，橡胶业之兴替，各籍贯华人相续大量移入和崛起，潮州帮不再那么坐大。

³⁰ “Johore Jottings. The Chingay Procession”, *Malays Tribune*, 5 March 1929, Page 11.

³¹ 何醒民寄稿〈对于柔佛迎神出游之感言〉，《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评论〉，1921年3月25、28、29日连载。

³² 柔佛特约记者永鸣〈柔佛迎神前后观〉，《南洋商报》1935年3月1日，第八版。另，战前报章之记录，跑先锋的是广帮华光大帝，而非今天的海南帮（琼帮）赵大元帅队伍。

³³ 1935年，《南洋商报》记者永鸣记述，广帮和客帮“只有数人打鼓打锣，抬神，其简便实为各帮所仅见”。见永鸣〈柔佛迎神前后观〉，《南洋商报》，1935年3月1日，第八版。

³⁴ 何醒民寄稿〈对于柔佛迎神出游之感言（四续）〉，《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评论〉，1921年3月28日，页十四。

³⁵ 何醒民寄稿〈对于柔佛迎神出游之感言（四续）〉，《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评论〉，1921年3月28日，页十四。“黑藉中人”何指？待考。或为“黑帮”会党中人，或为吸食鸦片者，抑或是雇佣印度籍人士。

³⁶ 见永鸣〈柔佛迎神前后观〉，《南洋商报》，1935年3月1日，第八版。

³⁷ 《天南新报》，1903年2月19日，本馆新闻。

“柔佛赌骂永寿年班并多派叫脚来坡，邀人往博。以故嫖赌饮吹之流群，趋之若鹜。闻有美芝律某商号之陈某甲挟资往博，竟一败涂地，输去洋九千余元。又长太街某媒院鹅母名亚拉者，亦输去千余元，半日间该赌马已杀人银壹万余元。该赌骂中各赌徒无不欣欣然，有喜色云。”³⁸

隔年《南洋总汇新报》又一则报导〈柔佛赌码之喜中悲〉亦记“昨自廿日至廿二日为柔佛大日子之期。各赌码张灯结彩，唱演梨园，烟花竞放。一般红男绿女之有盘癖者，皆趋之若鹜，是诚赌棍刮取华侨血汗钱之好机会也。”³⁹中文媒体文化人认为“迎神赛会，破耗资财。诚属无谓之举”，呼吁“所望该埠居民，此后永远革除。渐进于文明可也。”⁴⁰

五四运动以后，尤有进者，本地中文媒体虽然仍有报导游神之热闹情景，但却直指游神是“迷信”，宜当革除。⁴¹呼吁“柔佛迷信之一班，可以醒矣”！把参与游神表演的孩童说成是“妝饰怪物，手舞足蹈”，认为是“贻羞国体者矣”。⁴²进入1930年代，社会上出现撙节费用以资“祖国”（中国）筹赈之需的呼吁。1932年甚至因赈济“一二八事变”上海难民，新山华社领导层突然宣布取消是年的游神活动，并将所筹获的游神款额汇至上海移款纾难。⁴³这是目前文献所及，战前唯一的一次停办游神活动记录。另，1939年和1940年新山华社也曾两度开会讨论是否取消是年游神，惟最终仍是“习俗难免”，依旧举行。⁴⁴1939年《南洋商报》以〈新山同侨仍迷信神权〉为标题，劝请新山华社基于“自国难以来，海内外侨胞实行节约救国”，游神之举行“各种消耗则略加撙节”。⁴⁵不过社会上仍是“耗资颇钜”来筹办，游神依旧热闹。鞭炮轰轰，动辄三四百叻币（折合国币二千余元），不禁让中文媒体记者慨叹若把这笔钱“汇到祖国”，“不知可救多少灾难同胞，和卫国的受伤战士。这样不上两点钟，白白耗费去了几百元，实在没有价值”。⁴⁶所以中文媒体和文化人的关怀视角和现实之中的“华社乡愿”，明显是存在很大的落差。

³⁸ 《南洋总汇新报》，1910年3月2日，第三版，本坡。

³⁹ 《南洋总汇新报》，1911年2月21日，第三版，本坡。

⁴⁰ 《南洋总汇新报》，1914年2月11日，第三版，本坡。

⁴¹ 〈迷信宜除〉，《新国民日报》，1920年3月18日，第六页，本坡要闻。

⁴² 《新国民日报》，1926年3月8日，十二版，华侨消息。

⁴³ 〈柔佛方面我侨胞移款纾难，希望一般人当知取法〉，《新国民日报》，1932年2月27日，第六版，本坡要闻一。

⁴⁴ 〈柔佛华侨公所订期会议，讨论迎神〉，《总汇新报晚版》，1939年2月28日，第一张第三版；〈新山吾侨习俗难免，将迎神三〉，《南洋商报》，1940年2月26日，第十五版，南洋要闻三。

⁴⁵ 《南洋商报》，1939年3月6日，第十五版，南洋要闻三。

⁴⁶ 柔佛志声夜学道通〈柔佛游神记〉，《总汇报早版》，1940年3月5日，第四张，第四版，学生界。

结语

本文从“纵向”和“横向”寻根探视柔佛古庙游神的历史，就历史视野和研究方法而言，探讨新马本地华人历史文化之传统和渊源，不能只是“在地”的“进村找庙”。就溯源的研究路径上，除了“横向”深入挖掘新马华人的新史料，我们还得“纵向寻根”，往其中国祖籍原乡做实地的田野调查和探讨，重视中国祖籍地的地方文献和实地观察，在中国“慢行、细看”，我们会发现更多预想不到的“关联”场景。而从中国祖籍原乡和新马本土的探察对比中，更能探析新马华人，例如柔佛古庙游神的“潮州渊源”，以及这种潮州“营大老爷”如何在新山华社扎根及其在地化演变。

而就“横向寻根”的在地新史料挖掘，除了田野调查和考古，我们会发现若仅从一般社团特刊或后人的口述历史追述（有时很可能只是人云亦云），恐怕只能窥其表面现状。为补此不足，在电子化时代，庆幸的是，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已把多份新马旧报章给做了每一页的扫描并公开放上网。这对本地华人之研究无疑是具有正向价值意义的。因而若从网络扫描版之旧报章的深广搜索柔佛古庙游神新闻，从时序罗列，整理相关报章报导，得以重新概览和细腻的重新探视，会有更动态的历史透视。

仅就柔佛古庙游神在战前新马中英文报章的报导，把不同语文的文字报导拼合对看，亦能更深入探析新山华社和柔佛古庙游神的实际样貌。柔佛古庙游神这个新山华社的民俗盛会，在战前中文和英文报章都有报导和记述，然而英文报章的报导多是基于地方社会治安和治理之考量，但中文媒体则是在据实报导之同时，常得赋予匡正社会文化之职责，规劝与批判。五四以后更是直斥游神文化为“迷信”，但这似乎又无阻于游神文化之续办。文化人与华人庶民社会之间的认知是存在落差的，却也看出当时以中文书写的文化人和媒体记者既有对当时的“祖国”（中国）的情怀，亦有其新马在地的关怀。

参考文献

- 安焕然, 2018a, 〈国家介入与华社回应：马来西亚柔佛古庙游神的在地化演变〉，张琼惠、梁一萍主编，《移动之民：海外华人研究的新视野》，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出版中心，页237-255。
- 安焕然, 2018b, 〈马来西亚柔佛古庙的“保庙”与“重建”〉，陈益源主编《台湾寺庙文资保存与社会贡献》，台北：里仁书局，页539-560。
- 安焕然, 2018年3月, 〈柔佛古庙五尊主神的在地历史情境与脉络〉，《2017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年刊—义兴、古庙与华人社会专题》，页61-64。
- 安焕然, 2017, 《文化新山：华人社会文化研究》，新山：南方大学学院出版社，2017。
- 安焕然, 2011, 〈神人嘉年华：柔佛古庙游神文化的承传与再造〉，叶树姗《2011妈祖国际学术研讨会：民俗、观光与文化资产论文集》，台中：台中市政府，页19-39。
- 安焕然, 2008年10月, 〈柔佛古庙及其游神传统的演变〉，《南洋学报》，第62卷，页35-50。
- 陈景熙, 2006, 〈孙雨仙信仰研究〉，《潮州学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页11-32。
- 陈再藩, 2007年3月11日, 〈正月营老爷永远精彩〉，《星洲日报》大柔佛·大家谈版。
- 陈支平, 1991, 《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黄挺, 1997, 《潮汕文化源流》,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纪茂深, 1970, 〈新山市之动态〉, 《新山中华商会庆祝银禧纪念特刊》, 页173-175。
- 李永球, 2006年3月19日, 〈游神是宗教文化〉, 《星洲日报》星洲广场“田野行脚”专栏。
- 莫家浩编, 2017年2月, 《战前报章有关柔佛古庙游神文献资料辑录》, 新山: 南方大学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学术单刊第十八种。
- 潘醒农编著, 1950, 《马来亚潮侨通鉴》, 新加坡: 南岛出版社。
- 沈敏, 1996再版, 《潮州年节风俗谈》, 潮州: 研轮印务局(初版1937年)。
- 舒庆祥, 2000, 《走过历史》, 新山: 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 吴华主编, 2006, 《陈厝港方志》, 新山: 新山中华公会教育委员会。
- 吴华, 1997, 《柔佛古庙专辑》, 新山: 新山中华公会。